

《诗经》学述评

吴 鹭 山

一、先秦《诗经》学

谈先秦《诗经》学，需要从孔门的诗学谈起。因为孔子是先秦时代诗学的唯一倡导者。他对后来有其传授的渊源关系。

孔子是否曾经删过诗，像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里所说的把三千余篇诗删成为现存的三百〇五篇，不一定可信。但是孔子对于诗这部分文学遗产确实很重视，曾经做了一番整理功夫。《论语》记载他的自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”可见孔子在诗乐的整理方面颇有贡献。孔子的门弟子亦曾经这样称述他：“子所雅言，诗书执礼皆雅言也。”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说诗的比之说书说礼的都要多。他对门弟子极称学诗的好处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，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近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他在这里提出了“兴观群怨”之旨，对诗学的倡导起了积极作用。孔子也尝以诗督教他的儿子孔鲤：“汝为周南召南矣乎？人而不为周南召南也者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乎！”孔子几乎把诗三百篇作为他的教科书。《论语》还记载：“南容三复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”这也可见孔门对学诗是如何的重视！

在孔子以前，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往往把诗来比附政治，主要的是利用诗作为一种外交辞令，断章取义，无涉诗旨。《左传》中所记载的赋诗，如鲁昭公元年郑伯享赵孟叔孙豹等，郑子皮赋《野有死麋》之末章。鲁昭公十六年晋郑之会，子大叔赋《褰裳》、《蔣兮》、《有女同车》，即是显例。孔子尝谓“诵诗三百，授之以政不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！”这也正说明了当时上层社会学诗的风气和诗在政治上的作用。但孔子既是“教育家”亦是“哲学家”（是封建时代的教育家和哲学家），诗三百篇到了他的手里，又从比附政治转而比附义理，形成了孔门的诗学特点。诗本来是文学作品，而孔子却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它，把它作为义理说教的工具。所以孔子所说的诗也常常不是诗的本来面目。如他说：“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以孔子的道德观来看，三百篇中的那些郑风、卫风叙写男女爱情的诗，当然皆属于“淫邪”一类。然而孔子为什么要说“思无邪”呢？这里大有文章。他说这几句话的意思是，诗的内容正当的可以劝善，不正当的也可以惩恶。那末所谓“淫邪”一类的诗，也可以用来作为反面教材。这几句话是孔门的诗学大纲，也就是后来汉儒说诗强调美刺的张本。《论语》里记载子夏问诗一节，更是孔门说诗的典型例子：

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，何谓也？子曰：绘事后素。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予者商也，（即指子夏，子夏姓卜名商）始可谓言诗已矣。

子夏在这里所举的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”三句诗当是逸诗。前两句见《卫风、硕人》，是称说卫庄姜的美。但《硕人》没有“素以为绚”一句。这三句诗无论怎么解释，只能解释作描

写女子的美貌。“素以为绚”当是形容女子的施粉（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四回喜出望外平儿理妆的施粉）或其它妆饰像后世“额黄”之类。孔子是哲学家兼教育家，是“非礼勿言”的，和门弟子说诗更其不好意思随便涉及女人。他所答的“绘事后素”当是遁词（在遁词里也就包含着说理的成分），完全答非所问。子夏接着讲的话“礼后乎”，那更是驴头不对马尾了。他不是说诗，而是对“绘事后素”的演绎。因为他们都不是从文学观点出发来看诗，而是以哲学的有色眼镜来看诗，把诗比附义理，只要对义理有所阐发，就不妨离题千里。所以孔子对子夏有“起予”之叹。郑樵谓“孔子言诗皆取诗之声，不曾说诗之义。”（见《六经奥论》）这论断显然是错误的。孔门诗学正是说诗之义。不过他们以诗作为义理说教而不是把诗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罢了。

孔子门弟子很多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谓孔子弟子三千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）传授诗学的不止一人。而子夏当是孔门传授诗学的“高第”。孔子尝说“文学子游子夏”。观以上子夏和孔子的谈诗，也可以知道子夏确是孔门诗学的嫡派。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序：“卜商阐其业，雅颂与金石同和。”也正表明了这一点。后来诗学专著《毛诗诂训传》（简称毛传）据说就是与子夏有传授的渊源关系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谓“毛公之学，自谓子夏所传。”陆玕《毛诗草木虫鱼疏》对这传授关系曾经做过较详细的记述：

孔子删诗授卜商，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，申授魏人李克，克授鲁人孟仲子，仲子授根牟子，根牟子授赵人荀卿，荀卿授鲁人毛亨，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萇。

据陆玕所说，子夏的诗学五传至荀卿，荀卿再传而至毛公。陆玕是三国吴人，去汉代较近，他的记述不至全无根据。但他谓孔子

删诗及子夏为之序则未必可信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引陆玑同时人徐整所记述的诗学传授关系和陆说颇有差异^①，但是对毛诗溯源于子夏这一点却是相同。我们从现存的毛传来看，他的说诗强调美刺（意谓诗都有劝善惩恶作用）以比附义理，应该与孔门的诗学有其渊源关系。说毛诗出于子夏，虽无确证，尚较近是。

这里还需要注意，陆玑所提到的子夏五传至赵人荀卿，这荀卿是战国末期的著名学者，他也是诗学传授中的一个重要人物。前人曾因荀子《非十二子》有“子夏之贱儒”的话，怀疑荀卿的诗学必非出于子夏。（见皮锡瑞《经学通论》）这也很对。但荀卿的学术思想属于儒家，他受孔子影响很深。^②现存的《荀子》一书，引用诗三百篇的句子特别多，就中也可以看出他和孔门的诗学关系。即使不出于子夏，亦当出于孔门无疑。汪中容甫《荀子通论》说：“荀卿之学出于孔氏，而尤有功于诸经。”这诸经也当然包括《诗经》而言。荀卿对于诗确曾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。汉代的诗学无论是今文派古文派，都和荀卿有些渊源关系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谓元王尝与申公“俱受诗于浮丘伯”，又谓“伯者孙(荀)卿门人也”。（汉桓宽《盐铁论》亦说包丘子与李斯俱事荀卿。汪中述论认为包丘子即浮丘伯。）申公属鲁诗，可见鲁诗出于荀卿。《荀子·荣辱篇》引诗《商颂·长发》：“受小共、大共，为下国骏蒙。”今《诗经》“骏蒙”作“骏庞”。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云：“庞作蒙，鲁诗也。”这也足以说明鲁诗和荀卿的渊源关系。《韩诗外传》引荀子诗说有几十处之多，可见韩诗亦曾受荀卿诗学的影响。陆玑谓“荀卿授鲁人毛亨”，这话如可信，则毛传更是荀卿的直接继承者了。所以程大昌说：“汉世诗学，皆自况（荀子名况）出”。

注

- ①《经典释文》引徐整说：“子夏授高行子，高行子授薛仓公，薛仓公授帛妙子，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，毛公为《诗诂训传》以授赵人小毛公。”
- ②朱熹《楚辞集注·后语》成相篇注：“荀卿学于孔氏门人驺臂子弓。”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有驺臂子弘，谓孔子再传易于鬻，鬻传驺臂子弘，弘当是弓字之误。

二、汉代与宋代的《诗经》学

汉代的《诗经》学，有今文派古文派之分。齐鲁韩三家诗^①是今文派，而毛诗^②是古文派。西汉时，齐鲁韩三家诗盛行，被列于学官，设置博士。《史记·儒林传》说：“言诗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轅固生，于燕则韩太傅（韩婴）。”这说明三家都是当时诗学界的权威。毛诗比较晚出^③，初先只在民间传授，到东汉时方始流行。由于东汉的著名学者如郑众、贾逵、马融、郑玄等都提倡毛诗，因而毛诗才被人们所重视。郑玄曾写了一部《毛诗传笺》（简称郑笺），发明毛义，这对毛诗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。因为郑玄在汉代末年的学术界负有重望，所谓“读书不到康成（即郑玄）处，不敢高声论圣贤。”毛诗得了他的笺注，自然提高了地位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谓“自郑笺既行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。”（《四库总目》亦如此说）这是事实。

但郑玄治学不名一家，他的《毛诗传笺》虽主古文派，然间亦采取今文派齐鲁韩三家诗说，加以疏通说明。“如有不同，则下己意”（《见六艺论》）。所以郑笺与毛传常有出入，亦互有得失。例如《邶风·旂丘》：“叔兮伯兮，戢如充耳”之充耳，毛传训盛饰，郑笺则训塞耳，是毛传失之而郑笺得之。又《邶风·

简兮》：“简兮简兮，方将万舞”之简，毛传训为大，而郑笺训为择，是毛传得之而郑笺失之。同时，郑玄笺诗除文字训诂外，偶亦借题发挥，即陈澧所谓“郑笺有感伤时事之语”者。例如《小雅·小宛》：“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”笺则云：“衰乱之世，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。”又《卫风·考槃》：“独寐寤歌，永矢勿谖。”笺则云：“觉而独言，长自誓以不忘君之恶。志在穷处故云然。”这不仅是感伤而是近于感愤了。它确也表露出一些说诗者自己的思想感情，和毛传仅仅局限于文字训诂有所不同。魏晋以来学者，对毛传郑笺的优劣颇持异见，曾经引起了争辩。王肃（魏时人）、孙毓（晋时人）等申毛驳郑，而王基（魏时人）、陈统（晋时人）等则驳毛申郑^④，争辩前后历数百年，迄无定论。实际上，毛传郑笺所不同者主要还是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，至于宗奉小序，主张美刺，它们都是相同的。唐孔颖达著《毛诗正义》，为毛传郑笺作了一次总结。他汇集了魏晋南北朝学者研究《诗经》的成绩，撰为此书，内容相当丰富，诚如《四库总目》说的：“融贯群言，包罗古义。”很有参考价值。但孔颖达仍是迷信毛传说诗传统，恪守“疏不破注”的原则，对毛郑说诗的分歧只作弥缝，不加判断。这是孔疏的缺点。朱熹曾经指出过：“唐初诸儒为作疏义，因讹踵陋，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于二氏之区域。”（《诗经遗说》）这里说的“疏义”即指《毛诗正义》，“二氏”即指毛郑。朱熹这几句话对《毛诗正义》的批评是尖锐而中肯的。

《诗经》学自汉历唐，大都没有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。到了宋代，方才获得革新。这一次革新，也可以说是反毛郑诗学的运动。宋儒对毛郑的说诗开始怀疑，欧阳修、郑樵、王质、朱熹们都是毛传的怀疑派。欧阳修作《诗本义》，对毛郑说诗颇多驳议。《四库总目》谓“自唐以来，说诗者莫敢议毛郑，虽老师宿

儒亦谨守小序。至宋而新义日增，旧说几废。推原所始，实发自修。”这是确论。郑樵作《诗辩妄》，王质作《诗总闻》，攻击诗序，驳难毛郑，亦皆有披荆斩棘的功绩。至朱熹《诗集传》出，更为宋代《诗经》学的革新奠定了局面。《诗集传》的特点，第一是废小序。小序不知何人所作，或以为出于孔子，或以为出于子夏，或以为是子夏、毛公（即毛亨）合作，皆不可信。据郑玄说：“诸序本自合为一编，毛公（这毛公当指小毛公毛萇）始分以寘诸篇之首。”那么在毛公以前，小序和诗原自分开。把小序冠于每诗之首，这是毛公的作俑。诗被加上了小序，就好像诗人先自命题，而诗却依命题而作。难怪王安石曾怀疑小序“乃诗人所自制”。郑樵、朱熹攻击小序最力，郑樵认为小序是后汉卫宏所作，他举出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为证：“卫宏从谢曼卿学毛诗，因作毛诗序，善得风雅之旨，于今传于世。”（见《六经奥论·诗序辩》）而朱熹则认为“小序尚不是卫宏一手，多是两二手合成一序。”（见《诗经遗说》）然朱子废小序，实受郑樵影响。他说：“旧有一老儒郑渔仲（即郑樵），更不信小序，只依古本叠在后面，熹今亦如此，令人虚心看正文，久之其义自见。”（见《诗经遗说》）他也尝述自己对小序的怀疑经过：

熹自二十岁读诗，便觉小序无意义。……当时初亦未尝质诸乡先生，皆云序不可废，而熹之疑终不能解。其后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人所作。

这可见朱熹的废小序是经过较长时期的考虑的。杨慎《丹铅录》谓“朱子激于吕东莱（即吕祖谦）太尊小序，遂尽变其说。”（《四库提要》亦如此说）当非事实。总之，小序确是诗的障碍，曲说附会，不胜枚举。即如它所说的那些诗的本事，谓《行露》是召

伯听讼，《绿衣》是卫庄姜伤己，《击鼓》是卫州吁用兵暴乱等等，好像都有历史事实，而其实皆出于臆测，不可凭信。从来多少学者就被这些小序所贻误。所以近人梁启超曾这样慨叹地说：“欲治诗经者，非先得毛序拉杂摧烧之，其蔽障不知所极矣。”（见《饮冰室全集·要籍题解及其读法》）此虽是过激之谈，但小序对诗确是害多益少，有弃去之必要。朱熹的废小序，正表现了他的识见和魄力。废了小序，犹如人体上割去了赘疣一样，使三百篇重新获得了生机。这是《诗集传》的特点，也就是朱熹对诗学的贡献。其次是反对美刺。由于毛郑们主张三百篇无“淫邪”之诗，所以对郑风卫风等诗认为也都有劝惩作用，不是美就是刺。尤其是说那些男女爱情的诗，牵强附会，全失诗旨。如说《桑中》为刺奔，《溱洧》为刺乱，《将仲子》为刺庄公，《蓀兮》、《狡童》、《有女同车》、《山有扶苏》等诗为刺忽。把具有活泼泼的思想情感的文学作品，都变成了义理说教，枯燥无味，如同嚼蜡。朱熹《诗集传》既废了小序，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以上这些诗皆是男女相悦之作，不关美刺。朱熹是理学大师，但他说诗却比较实事求是，能够拿下了有色眼镜来看这些里巷歌谣，还它本来面目，一扫汉儒陈陈相因的迂腐说法，最大胆也最有见地。黄震尝怪朱传“尽去美刺，探求古始，其说颇惊俗。”（见《黄氏日抄》）不知“惊俗”正表现了朱熹的识见的卓越处。王应麟《诗考》序谓“朱子闚意眇指，卓然千载之上。”这不是过誉。

但是，朱熹的《诗集传》也还存在着不少缺点。由于朱熹是封建时代的一个正统道学家，他的世界观当然不可能没有局限。他指出郑风卫风等诗为里巷男女相悦之作是对的，可是他对这些男女相悦的情歌，不斥为“淫女之词”，就斥为“淫奔之诗”，终究表露出道学家的封建传统观念。朱熹废小序，但他对小序的

陈腐说法还是扫除未尽。如说《关雎》认为是为文王太姒而作，仍落小序所谓“后妃之德”的窠臼。说《野有死麋》认为是南国被文王之化，女子有贞洁自守，不为强暴所污，也仍沿袭了小序所谓“恶无礼”之说。而且朱传说二南几乎篇篇附会为文王之化及后妃夫人之德，更足以证明朱传依然摆脱不了序说的拘囿。所以姚际恒有“遵序者莫如集传也”之讥（见《诗经通论》）。又诗序六义有赋、比、兴之说，以赋、比、兴说诗原是汉儒家法，朱传亦采用赋、比、兴说诗而更变本加厉，每章之下都要标明“兴也”或“比也”“赋也”之类。这样说诗亦欠妥当。赋可兼比、兴，而比、兴亦不能不兼有赋的成分，未可厘然分开，即郑樵所谓“赋备比、兴之义”（见《六经奥论》）。今硬把每章拘限在赋、比、兴的框子里，那就把诗都说死了。总的来说，朱熹对《诗经》学的革新是有功的，但他的革新还不够彻底。

毛传因为朱熹的《诗集传》一出而被夺去了千余年独占诗学界的地位，此是中国经学史上一件大事。然朱传在当时也就曾经引起许多人的批驳和论议，正如《四库总目》所说“最与当时相辨难”。朱熹的门弟子就有不少人对废小序表示怀疑^⑥。吕祖谦是朱熹的好友，也是学术研究上的唯一同志，但吕氏对小序的看法却和朱熹颇有分歧。他的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仍沿用了小序，与朱传分道扬镳。戴汗的《续吕氏家塾读诗记》和严粲的《诗辑》都以吕氏诗记为主。不过，这些人的识见和学力远在朱熹之下，是无可否认的。元明之际，朱熹的《诗集传》大行，学者说诗大都祖述朱传。如许谦《诗集传名物钞》、刘瑾《诗经通释》（元代）、朱善《诗解颐》（明代）等皆为朱传作了笺疏。从这里亦可以看出朱传对后来影响的深远。这主要由于朱传在诗学上确有其不可磨灭的成绩，能破能立。（郑樵王质们只能破而立尚不够）而当时统治者用朱传取士，亦是一个重要因素。《四库提要》

说：“元延佑中行科举法，始定诗义用朱子。永乐中，修诗经大全，始独以集传取士。”这正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时被列于学官一样，世之学者自然翕然从之。惟明代学风，受王阳明哲学思想的影响，所谓“六经皆我注脚”，人们说诗亦往往自立新意，不比元代学者墨守朱传之甚。然亦往往流于怪诞，何楷（玄子）的《诗经世本古义》就是典型例子。他自谓“仲子與氏（指孟轲）诵诗论世之旨”，把诗三百篇的年代作了编次，用二十八宿分部，始于夏少康之世，以《公刘》（大雅）、《七月》（豳风）、《甫田》、《大田》、（小雅）、《丰年》、《良耜》、（周颂）、……等诗为首，终于周敬王之世，以《曹风·下泉》为最后一首，完全打乱了风雅颂的次序和体制。像何氏这样的治诗，真可以说是“索隐行怪”！

注

①齐鲁韩三家诗，即指齐人轅固生、鲁人申培公及燕人韩嬰所传诗说。

②毛诗，即指鲁人毛亨作的《诗故训传》。简称毛诗或毛传。

③郑樵《六经奥论》谓毛诗至汉武帝时始出。

④魏王肃作《毛诗注》、《毛诗义驳》、《毛诗奏事》、《毛诗问难》诸书（书今佚）申明毛传，驳难郑笺。王基（郑玄弟子）则主张郑笺，作《毛诗驳》以驳难毛传。晋孙毓作《毛诗异同评》申明毛说。陈统则持异议，作《难孙氏毛诗评》，以申明郑笺。

⑤《诗传遗说》徐昭然问：“先生去诗序，似使学者难晓。”周谟问：“先生诗集传多不解序何也？”

三、清代诗经学

清代统治者，对汉族知识分子是特别疑忌的。他们一方面采用高压政策，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递兴文字狱进行恐怖统治；另一方面又采用柔化手段，在利禄引诱下提倡朴学，导使知识分子钻进了文字训诂的牛角尖，藉以消除反满思想。当时的诗经学，也因为这种政治背景的关系形成了崇尚训诂的风气。康熙的《钦定诗经传说汇纂》和乾隆的《钦定诗义折中》，也就具有这种政治作用。所谓“附录旧说”、“参稽古义”（见《四库提要》）亦正暗示着对朴学的提倡。特别是乾隆弘历，居然以经学家自命，在“御制”诗中竟有“晦翁（即指朱熹）旧解我疑生”之句，那些御用文人奉为“纶音玉旨”不要说起，就是那些稍有头脑的知识分子，也谁敢说半个不是。“分章多准康成，征事率从小序。”（《四库提要·钦定诗义折中》）毛传诗学又从而大大抬头。而当时的一些所谓汉学家，就在康熙、乾隆这种“钦定”的诗学范围内从事著作。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编》、戴震《毛郑诗考》、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以及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、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，也就前后应运而出。他们都以汉学相标榜，贬抑朱传，于是形成了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争，而朱传所受的批驳亦最多。即如王夫之的《诗经稗疏》、姚际恒的《诗经通论》，虽不专以汉学相标榜，但对朱传也时有挑剔驳难，这也当是时代的风气使然。皮锡瑞云：“宋人竞立新说，至朱子集其成。元明一概尊崇，近人一概抹杀。”（见《经学通论》）这确能说明当时学术界的大略情况。平心而论，从诗的文字训诂方面看，清代朴学是有贡献的，但从推求诗的本旨以及诗在文学创作上的意义看，清代这些学风的出现乃是逆流。文字训诂固然也

很重要，但文字训诂只能作为研究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。清代的朴学家在恐怖统治和利禄引诱下，大都钻进了文字训诂的牛角尖而不自觉，迷信小序，迷信毛传，甚至迷信《尔雅》（尔雅未必是先秦古籍），而对诗的本旨以及诗的文学意义反置之不论，舍本逐末，把刚才洗刷出来的诗三百篇，重复推入了穿凿附会的泥淖。这对诗经学的发展来说，当然不是前进而是后退。

乾嘉（指乾隆、嘉庆）以后，又掀起了一次反毛传的运动。当时今文家是比较具有革新思想的一个学派，他们提倡齐、鲁、韩三家，以攻击毛传及毛传中的大小序。魏源是这运动中的代表。他的《诗古微》为今文派诗学大张旗鼓。陈乔枏的《韩诗遗说考》、《齐诗遗说考》、《鲁诗遗说考》，王先谦的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，也都对今文派诗学的提倡做了努力。这运动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，但他们对诗学的推进所起的作用不大。因为魏源们所提倡的三家诗本身就很有问题。第一，三家诗早已亡佚。齐诗亡于魏，鲁诗亡于晋，韩诗到了南北宋之间亦只存外传。而他们所举的三家诗说仅仅是依据古籍中一些孤文剩义，未必可信。而且三家的说诗是否即得诗的本旨也还成疑问。例如《关雎》一篇，齐鲁韩三家都以为刺康王晏朝而作^①，和毛诗所说全异。这就很值得商榷了。依我们现在看来，《关雎》这首诗当是古代的婚礼乐歌（另详拙撰关雎新解），它既不是像毛诗所说的后妃之德，也和三家诗所说的刺康王晏朝根本没有关涉。

魏源们说诗，一方面反对毛传，一方面也不主张朱传。而实际上，他们的反对毛传，反对小序，很明显是受朱熹《诗集传》的影响的^②。同时，今文学家的说诗，喜欢标新立异，他的流弊就是武断。如魏源谓《关雎》作于殷周之际（见《诗古微·诗序集义》），谓二南及小雅皆当殷之末季文王与纣之时（见

《诗古微、四始义例》),都是臆测之谈,未足为据。龚自珍示儿诗:“俭腹高谈我用忧,肯肩朴学胜封侯。”龚氏是今文学家,属魏源一派,但他已有感于今文家的流弊。

诗经学至晚清时转趋沉寂,只有方玉润的《诗经原始》稍有可观。他不采用小序,也不采用赋比兴说诗,较有见地。但是他过分自信,有时仍惑于《左传》赋诗的断章取义,更多附会。如认为《野有蔓草》(郑风)两见于《左传》,不得为“淫诗”,遂附会为朋友相期会之作。尤其可笑的是说《草虫》(召南)和《野有死麋》,以为《草虫》是“思君念切”,《野有死麋》是“拒招隐”,显然不是诗旨。以男女爱情来比拟所谓“忠君爱国”或士大夫出处,这是文学发展到了高峰以后的事,《离骚》虽曾有美人香草之喻,也不过是运用几个句子来作比拟罢了。唐代诗人才始广泛地运用了这种艺术手法^③。而在《诗经》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有什么艺术创作手法的。又方氏的《诗经原始》既废小序,而自己复立了类似小序的解题冠于每篇之首,这无异于把诗摘掉一个帽子又换上一个帽子,比之魏源的《诗序集注》、龚橙的《诗本谊》更为僭率。

注

①参阅皮锡瑞《经学通论·论关雎为刺康王诗齐鲁韩三家同》。

②皮锡瑞《经学通论》谓“魏源之驳毛序,有朱子已言者。”

③如张籍的“还君明珠双泪垂,恨不相逢未嫁时。”(《节妇吟》)是作者在幕中却李师道之聘,以节妇自托。朱庆余的“妆罢低声问夫婿,画眉深浅入时无。”是作者登第后谢荐举作,以新嫁娘比拟自己。